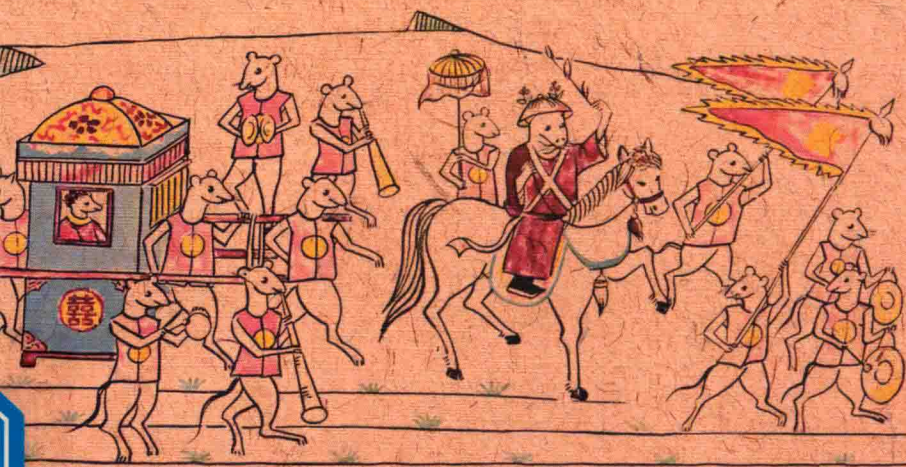


文艺民俗视野下的

鲁迅 创作研究

王元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艺民俗视野下的

鲁迅

创作研究

王元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民俗视野下的鲁迅创作研究 / 王元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 - 7 - 5203 - 4683 - 2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鲁迅著作研究 IV. ①I210. 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3633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刘 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说 明

本书的著述始于主持人博士阶段学习的思考，是本人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所申报的 201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成果修订的产物。

将本书和博士论文进行对比，可以清楚显见二者之间的延续和衍生关系，但是作为博士论文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研究，本书的写作体现出了较之先前研究更多的发展和创新内容：首先，扩展了原课题关注的范围和内容，增写了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八章的内容，让话题框架的建构更为周全和系统；其次，调整了原论文的内容，从相关的认知到具体的实践到意义的显现，将原先较为零散的论述重新整理和组合，凝聚成专门的章节，使论证更趋合理和紧凑；最后，深化了博士论文和项目研究所提及的一些话题，将原先一些未及展开的话题，结合新材料的搜集、梳理和理解、认知的提高，给予更为深入和具体的论述，显见出更多也更有价值的思考。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鲁迅创作民俗文化选择的时代因素	(7)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体的“向下看”意味	(7)
(一) 一个个案	(8)
(二) 两条路径	(10)
(三) 三种做法	(14)
二 新文学的民间化取向	(18)
(一) “平民文学”概念的形成	(19)
(二) 学术和文学的双面实践	(22)
第二章 鲁迅的民俗生活经验	(31)
一 生命初始时的民俗待遇	(32)
(一) 取名	(32)
(二) 其他	(34)
二 成长过程中的民俗事项	(36)
(一) 祭祀	(36)
(二) 看戏	(37)
三 婚俗的顺从和背叛	(39)
(一) 第一次婚姻	(39)

(二) 第二次婚姻	(43)
四 风俗纠葛中的疾病与中医	(46)
(一) 鲁迅有关中医的描述	(46)
(二) 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	(48)
(三) 鲁迅中医审视中的西学因素	(50)
(四) 鲁迅对于中医的文化思考	(52)
五 死亡事件的民俗参与	(54)
(一) 父亲之死	(54)
(二) 小弟之死	(56)
(三) 祖母之死	(58)
 第三章 鲁迅有关民俗文化和创作关系的理论思考	(62)
一 鲁迅关于民俗文化和创作关系的认知层面	(62)
(一) 民俗文化对于国民精神构成的作用	(63)
(二) 民俗文化对于新文学乃至整个新文化建设所具有的 作用	(64)
二 鲁迅有关民俗文化和创作的理论思考	(67)
(一) 民俗文化和创作发生理论	(67)
(二) 民俗文化和创作发展变化理论	(72)
(三) 民俗文化和民间创作理论	(75)
(四) 民俗文化和简洁风格理论	(78)
(五) 民俗文化和地方色彩理论	(83)
 第四章 鲁迅创作中的民俗文化表现	(90)
一 鲁迅创作中民俗文化表现的形态	(90)
(一) 作为文章的标题或书名	(92)
(二) 作为发论的由头或立论的依据	(93)
(三) 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或背景	(96)
(四) 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	(100)

(五) 作为创作所欲表达的主题意象	(103)
二 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主体处置	(107)
(一) 和周作人的比较	(107)
(二) 和沈从文的比较	(110)
(三) 和赵树理的比较	(113)
三 鲁迅创作民俗文化表现的影响性因素	(117)
(一) 时代背景因素	(117)
(二) 个人因素	(119)
 第五章 鲁迅民俗文化表现的民俗学价值	(122)
一 鲁迅民俗文化表现的存在特征	(122)
(一) 普泛化	(122)
(二) 多样化	(128)
二 鲁迅民俗文化表现的民俗学价值	(135)
(一) 对于民俗文化内涵的现代理解	(135)
(二) 对于民俗文化现实存在特征的精准把握	(138)
(三) 认知民俗文化的特殊途径和方法	(142)
(四) 对于民俗文化与文艺关系的新颖论述	(145)
三 鲁迅民俗文化认知的理论贡献	(148)
(一) 民俗文化观照时表现出的鲜明的当下属性	(148)
(二) 民俗文化认知时显现出的“可分性”辩证态度	(150)
 第六章 鲁迅创作民俗文化表现的文学价值	(153)
一 鲁迅创作所内含的两种民俗文化评判态度	(153)
(一) 批判一面	(154)
(二) 肯定一面	(156)
二 鲁迅民俗文化表现的文学价值	(159)
(一) 国民魂灵呈现的写作示范	(159)
(二) 貌似无事的悲剧形式发现	(163)

▷▷ 文艺民俗视野下的鲁迅创作研究

(三) 多样的艺术手法借鉴	(167)
(四) 地方色彩和民族特性的形成	(174)
第七章 鲁迅创作民俗文化表现的历史影响	(183)
一 鲁迅民俗文化表现对于后来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	(184)
(一) 同情一路的影响	(185)
(二) 批判一路的影响	(187)
二 后来中国作家的接受及其鲁迅写作的资源再生意义	(191)
(一) 顺应的接受	(191)
(二) 主体的变异	(192)
(三) 后来作家的问题和鲁迅的意义	(193)
第八章 鲁迅民俗文化思考 and 表现的他者视域及域外反响	(196)
一 鲁迅民俗文化、文学关系思考 and 表现的他者视域	(197)
(一) 异域情调	(198)
(二) 反抗之力	(199)
(三) 对比之用	(200)
二 鲁迅民俗文化思考 and 表现的域外反响	(202)
(一) 自身价值的新发现	(203)
(二) 世界启示	(205)
(三) 必要的说明	(208)
鸣谢	(211)

引 言

作为 20 世纪中国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鲁迅本体以及因此而形成的鲁迅映象，使“鲁学”成为中国现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时至今日，鲁迅研究已然到了一种研究空间日益逼仄、研究话题愈来愈少的地步。有鉴于此，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新的途径，从而推动鲁迅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了极富学术和现实价值的选择。

客观地讲，鲁迅和民俗文化的关系并非一个全新的话题。从鲁迅在中国新文坛面世开始直到现在，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发展历史中，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不同时代的学者对鲁迅及其创作和民俗文化关系的话题进行了多样且持续的关注：一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以周作人、孙伏园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亲近鲁迅的人从个人生活经验层面对于鲁迅创作的素材来源进行说明之时，对于民俗文化的有意无意涉及；二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以苏雪林、茅盾和张定璜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在考察鲁迅小说人物和乡土中国的关系以及鲁迅的创作对于其时乡土文学的影响时对于民俗文化的无意捎带；三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随着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左翼文艺阵营的一些作家以及国际友人如苏联的王希礼、日本的原野昌一郎和竹内好等在思考鲁迅创作中的国民精神形成和民族特色表现等问题时，对于民俗文化的有意无意介入；四是 1942 年之后，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渐

成为文艺的指导性政策，响应毛泽东要重视劳动人民“固有文化”的号召，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许多研究者如李希凡、李长之、陈涌等人在分析鲁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以及封建思想对于劳动人民的精神毒害之时有意无意对于鲁迅和民俗文化关系的指涉；五是新时期之后，随着新一轮思想启蒙运动的全面展开，在重新思考鲁迅创作中的反封建问题以及鲁迅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个体与群体复杂关系之中进行艰难的现代性思考和选择之时，学者王瑶、王富仁、汪晖、钱理群、王晓民等人对于鲁迅与民俗文化关系的有意无意涉及；六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研究热潮在我国的逐步流行，加之许多学者文艺民俗学意识的逐渐形成，我国学术界涌现出了许多批评者和研究家，开始较为自觉地对于鲁迅创作与民俗文化的关系进行这样那样的关注，其代表者如钟敬文、舒芜、王献忠、陈勤建、刘民凯、李景江、罗宗玉、邱国珍、陈漱渝、陈方竞、朱晓进、王晓初等，其中陈漱渝、陈方竞、王晓初等人从浙东民间文化对于鲁迅艺术修养的构成以及创作和学术风格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之类的思考，为渐趋僵化的鲁迅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为人们理解鲁迅及其创作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此外，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研究中，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思考给人帮助和启示最大。前者立足于鲁迅作品和其生活经验的对照阅读，其所著的《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故家》等文章和书籍，对民俗文化于鲁迅创作的沾养之功多所指陈；而后者在其所著的《“人”与“鬼”的纠缠》一书中，从浙东以及中国其他地区大量的民俗文化的考辨之中，重点分析了鲁迅几部比较重要的作品如《阿Q正传》《祝福》《伤逝》《在酒楼上》中“鬼”形象的来源及其在艺术处理过程中的变形和意义象征，其思考的方法和角度给人尤为深刻的印象。

不过，由于文艺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学术界的推广不力，加之许多研究者因为视野和修养而产生的对于鲁迅和民俗文化所持的种种偏见误解，所以涉猎和关注虽然不断呈现，但是总体上讲，在鲁迅

与民俗文化关系的研究中，目前已有的研究还是暴露出了如下一些明显的问题：第一，研究的不全面、不系统。受制于学术精力的投入和兴趣的局限，此前人们对于该话题的研究更多显现出了某种“文化客串”和“思想赞助”的性质，鲜有从时代语境、鲁迅的精神和思想构成、鲁迅的创作表现（包括他所有的文学非文学创作）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等方面做通盘/整体考虑或持久研究的，大多数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某一些、某一类或某一点，直到目前为止还鲜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专著出现；第二是不专业。这一问题有两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对民俗文化理解的不专业，不少研究者将民俗文化只看成是过去发生的已经僵死的文化遗留物，其认知从思想内部制约了他们对鲁迅和民俗文化的关系做进一步且有价值的学术思考。二是对鲁迅作为一个伟大创作者理解的不专业，其研究鲁迅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为民俗而民俗，不能将民俗的表现和鲁迅的艺术创造联系起来进行文学或创作的专业思考，所以无论是对鲁迅的理解还是对鲁迅作品的理解，都脱离了文学或创作的本位，难以给人实际的启示；三是研究的不深入。许多的研究只重视民俗现象的举例和一般性的文化分析，不能将民俗文化的表现和鲁迅作品人物的精神构成以及他本人深刻的文化思考联系起来，不能将鲁迅的表现和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更大的思考，所以其对于鲁迅和民俗文化关系的分析也便往往浅尝辄止，难以触及问题存在的关键和深刻处。因缘于此，所以本课题以“文艺民俗视野下的鲁迅创作研究”为话题，力求通过对鲁迅和民俗文化关系的双向分析，在国内学术界惯常的政治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视野之外，别寻一种理解鲁迅并其作品的新途径，从而通过一己的扎实工作，推动鲁迅研究的向前发展。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在惯常的政治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视野的考察之外，别立文艺民俗学立场，从民间文化这一独特视域，对于鲁迅和其创作进行新的理解，系统梳理鲁迅精神构成及其创作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推动鲁迅研究的新发展；第二，以鲁迅创作为研究个案，通过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主体处置和创作表现的

描述分析,考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作家对本土民间文化资源的作为,从一种特殊面向上重新梳理和描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或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反思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作家所应持有的文化立场和实际作为,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寻找一些经验和参照。

本课题以“文艺民俗视野下的鲁迅创作研究”为话题,主要思考这样三个问题:一是民俗文化是如何引起鲁迅的关注的?二是鲁迅是如何在其创作中对于民俗文化进行表现的?三是鲁迅的思考和表现发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又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三个问题的思考具化于如下八个思维层面:一、鲁迅创作民俗文化选择的时代因素;二、鲁迅的民俗生活经验;三、鲁迅有关民俗文化和创作关系的理论思考;四、鲁迅创作的民俗文化表现(与周作人、沈从文和赵树理的比较);五、鲁迅创作民俗文化表现的民俗学价值;六、鲁迅创作民俗文化表现的文学价值;七、鲁迅创作民俗文化取向的历史影响;八、鲁迅民俗文化表现的他者视域和域外反响。借助这样的思考,目的在于从新的视角对鲁迅及其创作进行审视,从现代作家和民间文化资源的关系建构中重新梳理和描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反思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中民族作家应有的立场和作为,为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寻找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参照。

本课题的研究,基本的思路是先以时代语境的还原和个人生活经验的介绍为主,具体思考鲁迅在新文化的建设和创作之时何以会对民俗文化发生兴趣;然后在此基础上,将鲁迅与周作人、沈从文和赵树理三个代表性作家进行比较,具体分析鲁迅创作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揭示其所具有的民俗和文学价值;最后,将鲁迅的思考和表现放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的大的时空背景之上,不仅从纵的维度考察鲁迅的取向对于后来作家所发生的历史影响,挖掘其具体的文学史价值,而且也从横的面向将鲁迅的作为置之于世界文学现代化的格局之中,反思在现代化进程中鲁迅的作为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寻找一种参照。

本课题的研究以文献举证、文本分析和作家比较为基本的方法,

其中文献举证主要用于时代语境的还原和个人生活经验的介绍；文本分析主要用于作家创作的具体表现描述和评析；作家比较主要用于民俗文化表现价值、意义的挖掘、揭示。三种方法统一于具体的文艺民俗方法的运用，整个研究不仅注意从民俗文化视角观照鲁迅及其创作，而且更注意从文学或创作角度审视鲁迅作品中的民俗文化表现，力求能够对鲁迅创作与民俗文化的关系进行民俗学和文学的双重观照。

鲁迅为什么会对民俗文化发生兴趣？在他的文学实践中又是怎样思考和处置民俗文化的？他的取向和作为给后来中国作家的创作以怎样的影响同时又显现着怎样的当下意义？这三个问题是本课题研究必须给予重点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三个问题解答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本课题研究最终所能深入的程度和取得成绩的大小，所以可谓本研究的重点和关键。本研究的难点有三：一是鲁迅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审视和观照民俗文化的？二是民俗文化的运用给予鲁迅的创作以怎样的影响？三是鲁迅借助于民族民间文化的资源所进行的民族作家自我形象的建构其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味是什么？他对于中国文学或发展中国家文学乃至当下文化建构的启示又是什么？因为鲁迅精神的丰富存在、鲁迅文本的多样表现以及民族国家现代化追求的复杂属性，所以在梳理与课题相关的话题时，本课题组成员深感上述三个问题涉及面广，构成复杂，极具难度和挑战意味。

通过上述的系统思考，本课题的研究所形成的基本观点为：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兴趣发生，既深受时代风气影响，又为个人生活经验所推动，但更与其独特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思考关系密切。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思考虽然不专业但却显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深刻，其对鲁迅的创作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他人相比较，鲁迅的创作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彰显了鲜明且突出的主体作为和个性色彩，缘此，这种表现不仅具有丰富的民俗学价值，而且更有十足的文学或审美意义，其对后来中国作家的创作发生了显著的影响。鲁迅的表现，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从一个特殊的层面形象地示范了民族作家主体在借助民族民

间文化资源参与世界文学现代性对话时应有的立场和方式，并为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经验启示。

而其创新之处则在于：第一，在鲁迅研究领域第一次全面和系统地对于“鲁迅创作和民俗文化的关系”进行思考，在惯常的政治文化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视野之外，别立文义民俗学这一观照鲁迅和理解其创作的新视角，改变人们传统的思维观念，推动目前渐趋式微的鲁迅研究向前发展；第二，以鲁迅创作为研究个案，同时将个案研究的结果放置于更为宽广的时空背景，在对鲁迅的思考和其创作所发生的历史影响的梳理反思之中，从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作家借助于民间文化资源参与现代性对话或现代文学构建这一特殊角度，重新梳理和描述中国文学的现代发生和发展历史，在更为复杂的世界一体化潮流之中，思考中国文学所应该具有的立场和选择，将研究的话题真正引入到有关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刻和关键之处。

第一章 鲁迅创作民俗文化选择的时代因素

谈到民俗文化和“五四”一代文化人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曾言：“不妨夸张一点说，五四时，差不多所有文化人都曾注意过民俗学问题。”^①他的话，说明了一个事实，对于民俗文化的兴趣，曾经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普遍所发生过的。为此，在梳理鲁迅创作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之时，本章首先将他的个人兴趣还置于“五四”新文化的整体语境，在时代文化和文学存活的整体背景下，揭示作为作家的鲁迅对于民俗文化发生兴趣的时代或外部动因。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体的“向下看”意味

从属性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本土所发生的一系列爱国救亡运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它的发生，有和此前同类运动大体相似的动机：即为中西冲突之时中国步步失败的现实所刺痛，精英知识分子奋发图强，希冀通过某种内部的变革，改变国家积弱不振的现状，从而在民族交往日渐频繁的世界新格局中，让民族和国人不再为他人所凌辱，赢得更多生存的机会和尊严。但也存在着认知观念及其变革思路上的明显差异：此前发生的诸多运动，无论是强调“富国强兵”的军事或经济的改革，还是提倡“国会立宪”

^① 刘玉凯：《鲁迅的民俗学观》，见《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的政治体制的改革，都显现出了这样一些基本的倾向：其一，更多是物质、实体层面的变革要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更为强调硬件的建设；其二，更多是仰赖权力上层——某种意义上讲，也便有更多朝臣奏请、皇帝颁布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意味。但和它们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更为注重精神或文化面向的思考，通过对于此前一系列改革失败教训的沉痛反省，几代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了社会改革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鲁迅的“立人说”，大家开始更为关注同时也更为用力于国民的精神教育和重建工作；此外，变求助圣君贤相忠臣为期待农民工人商贩，意识到上层人物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机构无可救药的孱弱和腐朽本质之后，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变向上的仰望而为向下的俯瞰，注意从作为社会基层的广大民众身上寻找社会变革的力量。

（一）一个个案

于此一面，梁启超可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参加戊戌变法运动之时，梁启超社会变革的思考，大体和康有为一致，意图即在于通过各种方式首先争得当朝皇帝的支持，从而将变革社会的意见，颁诏于天下，以期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得以贯彻实施。然而，他们的希望破碎于现实无情的击打：朝廷内部保守势力的不易撼动，皇帝的不能有所作为，周围其他大臣的临阵易帜，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终了只换得几个同僚的血溅街头，社会却依然继续衰弱着它的衰弱，腐朽着他的腐朽，并不曾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接受了来自现实的惨痛教训，在逃亡异域之后的比较反省之中，梁启超的认知逐渐产生了质的变化：从实体的政治改革到无形的精神教育，从寄希望于皇帝到看重普通民众，他开始将自己意欲有所大作为的贤臣良相的头颅向下低垂，将自己的目光投注在了身边普通的国民身上。他的变化突出体现于他的“新民”思想，通过将中国和西方现代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他不仅意识到了国家和民众之间存有着的高度一体的依赖关系，以为“国也者，积民而成也。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

经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享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①，而且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②。他的“新民”思想的实质，因此也就在于通过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改变和革新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培养自由、独立、有权力、守义务、讲公德的新国民，借此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救民族于水火之中。为此，他不惜四处奔走，做倡导“新民”思想的演讲，办宣传“新民”的报纸，进行小说界和散文界革命，创建了其流布极广且影响甚为深刻的“新民体”文学写作。

梁启超的变化体现出的是其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发生的普遍变化，翻译介绍西方诸般阐释民主、自由、独立、人道思想的文化学说，参与各种书籍的出版和报纸刊物的编辑事务，积极投身于各种公立私立的学校教育，大胆著书立说或进行社会批判，在从近代到现代的急剧历史变动过程之中，梁启超等为数不多的开明知识分子所逐步意识到的这些重精神教育、重国民培养的思想理念，为更为广泛的人群所接受，慢慢就演化成了一种能够体现一时代知识分子主要精神诉求的普遍认知，愈来愈全面也具化于时代生活的各个面向，对中国文化在新阶段的历史建构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这种影响的直接同时也是进一步深化的产物。谈及梁启超“新民”思想对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胡适曾讲：“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③ 不过，因为自身文化建构以及主体社会活动历史占位的不同，所以作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渡人物的梁启超和作为基本完成了现代转型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二者之间的年龄差距并不显著——在“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梁启超不过

① 梁启超：《新民说》（宋志民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② 梁启超：《发刊词》，见《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8日。

③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